

By Helen Foster Snow

(美) 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张士义 张香存 译

红都延安采访实录

廖承志

徐向前 王 震

林 彪 康克清

吴莉莉等人

首次向外界披露的

人生经历

中國社會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93 6585 4

By Helen Foster Snow
(美) 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张士义 张香存 译

红都延安采访实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都延安采访实录 / (美) 斯诺著; 张士义, 张香存译.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1

书名原文: The Chinese Coummunists: Sketch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Old Guard

ISBN 7 - 80146 - 993 - 3

I. 红... II. ①斯...②张...③张... III.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602 号

书 名: 红都延安采访实录
著 者: (美) 海伦·福斯特·斯诺
译 者: 张士义 张香存
校 译: 王 芳 张 莹 徐 琳
责任编辑: 孙晓青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46 - 993 - 3/K·52

定 价: 22.8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 华

副主任委员：爱泼斯坦

梅 益 萧 乾 凌 青
许力以

主 编：高 梁 单基夫

副 主 编：于国华 王新善 陈志强

杨鑫福 谢善骅

编辑委员：田家农 任天舒 汪大钧

吴 向 陈 辉 陈定华

陈秀霞 杨光辉 周顺庆

高履端 贾辉丰 崔 烈

总 序

黄 华

在中国近代史各个时期，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有的追求真理，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实况，赢得了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的呕心沥血，忘我无私，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勤奋工作，奉献才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促进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是各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卓越代表。虽然在国籍、肤色、语言、专业上各不相同，也各因不同处境而在一些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同情和爱戴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以能为此做贡献而感到光荣。中国人民因有这么众多的国际友人而自豪。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不少人留有自己的著作、自传、日记、书信等；也有中外作家、学者、亲朋好友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传记和回忆。这些著作大都记载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体现着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凝聚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期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解放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中所经过的历程。其中有些已被世界公认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必读的名著，曾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其中一些著作还影响了大批中国青年读者，激励他们投入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无疑，这是国际友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然而，在这些著作中，有的因年久而已失传或绝版；还有不少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使中国读者无缘拜读；许多国际友人未留有著作，而关于他们的事迹亟待加以收集和撰写。因此，发掘整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自从1991年以来，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各有关出版社和许多作者、译者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一套《国际友人丛书》，共有四辑，合41种。这套丛书以国际友人的传记为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出版后曾受到各界读者的重视和欢迎。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社会上还远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与有关的出版社商议，今后这套丛书将进一步集中编译力量，提

高质量，统一规格，加强宣传和发行工作，以期使它更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为中外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介绍国际友人的著作。

我相信，这一新的安排，将会为这套丛书带来新的起动和新的面貌。在我们面临 21 世纪即将到来的重大时机，我殷切期望，它能更好地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能在培育我国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情操、提高全国人民文明素质、增进各国人民间的互相理解和友谊等方面，起到它独特的作用，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们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无限感激和深切思念。长期以来，他们同中国人民不懈努力，艰苦奋斗，终于突破了中外敌对势力的阻挠和封锁，拨开了造谣诽谤者布下的雾障，帮助一切善良的人们摆脱社会成见的约束，他们在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与友谊的桥梁。今天，经过 20 世纪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奉献牺牲，迎来了曙光闪耀的 21 世纪。让我们预祝在未来世纪里各国人民间这座理解与友谊的桥梁更加坚固与宽阔；这支筑桥大军的队伍更加壮大与坚强；各国人民为争取人类和平、幸福、文明和进步的伟大事业不断发展，无比辉煌！

增订版前言

在 30 年代，我和我当时的丈夫埃德加·斯诺都有这样一种朦胧的意识——我们应该拥有同代人最为壮观的经历，而且我们基本上如愿以偿了。

1937 年春天，我离开了埃德加。他当时正在盔甲厂 13 号我们的住所写《西行漫记》。我从北京乘火车去了西安。我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到延安去探究红色中国的内幕，并采访埃德加一年前去那里时未能见到的一些人物。当时，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仍在人世。这个清王朝的后嗣在 1910 年时还坐镇北京统治着中国。然而，到了 1949 年，也就是斯诺西行十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入主紫禁城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的人民群众了。当时，我曾有一种预感，认为中国的历史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虽然日本时刻准备着向它发动进攻。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人果真在北京附近发起了攻击，并且到 1938 年底的时候，中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被他们占领了。

在北京，我们直接面临着日本人的威胁。没有一个美国人希望“失掉中国”，让它沦为日本的附庸。我知道中国患有致命的衰老和退化病，而且被内战弄得精疲力竭，以至于要想挽救这个古老的国家，使它从日本人的魔掌中解放出

来，惟一可以指望的便是“新青年”了。虽然自1915年起，中国的青年一代就以“新青年”自称了，但是，除了偏居一隅的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之外，其余的青年至今仍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武装组织。在北京，学生领袖因要求武装抗日而遭逮捕。自从1931年日本发动首次入侵以来，学生们就开始与蒋介石对立起来。反蒋是危险的，反蒋的人都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甚至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抓起来，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

俞大卫（即黄敬，原名俞启威——译者注）是我延安之行的发起人。他是出席即将于5月份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我们同乘一趟火车，彼此装作互不认识。他是学生运动的秘密领袖。当我们都安全抵达延安后，他才春风得意地告诉我说，他是北京（也许是整个华北，我记不清了）地下党的第二号人物。我猜到了他是共产党员，但没想到他还是个大人物哩。

在火车上，与我们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是东北大学王校长（王卓然）的儿子（王福时）。小王是作为我的译员随同前来的，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亲自写一些新闻报道。

到西安后，我发现军方刚刚发布了一项禁令，不准新闻记者去红色区域，特别是名字中有“斯诺”二字的人——当时，在西安或是南京，斯诺二字是最不受欢迎的。在戒严期内的一个夜晚，我躲过四个盯梢卫兵的视线，爬出窗子，乘坐杨虎城将军的专车到了云阳。

我终于来到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西北地区。延安是座小城，有锯齿状的城墙环抱和宋代修建的城门，外面还有一条护城河。它如同皇冠上镶嵌着的一颗明珠，坐落在峰峦迭起的群山之中，特点鲜明，别具一格。古城本身就是延安

神秘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古人和鞑靼骑兵曾越过这个隘口快速飞奔去征服文明的汉人。直到1937年初，延安才取代保安而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那时，埃德加·斯诺已经离开，红二、四方面军也已经结束他们的长征。

我想，我在延安的经历可以说是纯粹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除了毛泽东享有香烟补贴之外，人们所能得到的东西只有食品和仅够遮阳御寒的衣服。他们那里所实行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产品经济。

在延安，几乎没有什么机械化的东西，除了枪上肩时发出的铿锵声外，就再也听不到别的机器时代的任何声响了。那里没有汽车废气，没有化学制品，甚至没有一点铜臭气。延安的奥秘在于它的纯朴，整个景象都是纯净无暇的。

延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生活纯朴，思想高尚——类似于英国的新村，只是多了几分危险。它像儿童团的营地一样充满了欢乐。我所知道的不快乐的人全都是外国人——德国的李德、美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朝鲜的金山。对那些九死一生的人们来说，活着的事实就足以使他们感到快乐，并有一种特殊的成就感。

延安在文化上的震动是不轻的。我猛然间遇到了中国的一批精英。他们几乎全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个个都有超凡的魅力，令人刮目相看。其中有一些如肖克和林彪已经是传奇性的人物了。和埃德加·斯诺在一年前的做法一样，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停地记录这些卓越人物的见闻和生活故事，也由此与他们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也许还是第一次。把这些告诉一位外国人，需要进行很好的自我反省，而他们却很少有人事先进行准备。

在回顾斯诺的中国之行时，现在的人们会看出比我当时所能看到的更加重要的意义来。埃德加是被当做外来大使接待的。我则是以“美国记者的太太”的身份而受到欢迎的。并非共产党人的美国青年，主动去和受到封锁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这在当时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意义的人。但若不是埃德加·斯诺使他产生好感，那就没有人会对我们敞开心扉。既然毛泽东开了先河，那么其他人也就照例行事了。在1936—1937年以前，把自己的生平经历讲出来以供发表，这在共产党人中间还很少见——后来也没有形成风气。1971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对记者詹姆斯·莱斯顿说：“我们没有人写过日记，也没有人打算写回忆录。”

共产党人之所以向我们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俩都是冒着极大危险，冲破封锁后来到延安的。对于一个并非共产党员的外国人来说，如果能有这种冲破封锁的勇气和执着追求的进取精神，那么，他（她）是需要给予特别合作的。几乎每一位高层人物都曾主动来见我以示欢迎，只有林彪是个例外。我去拜访了他，而且，我想他应该知道这是有差别的。我不顾军方禁令，历经艰险与磨难逃出了西安，这对我而言也还是有益的。我因此而凭自身的条件奠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时至今日，人们可以看清楚已往的事情了：埃德加很聪明，也很可爱。他在1936年与毛泽东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70年代。在这几十年中，斯诺与毛泽东之间的个人关系是美国与毛泽东进行沟通的主要外交渠道。他不仅与毛泽东交朋友，而且也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交朋友。1971年，周恩来告诉莱斯顿说，他在美国的惟一

位老朋友就是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

在1937年的夏天，我记下了三十四个人的自传。其中，有二十四个载《红尘》一书（1952年版），三个载《现代中国妇女》一书（1967年版）。在这个增订版中，增加了刘群先、张文彬、吴莉莉三人的自传和丁玲自传的片段——学生时代。我把朱德将军的自传放在了《红色中国内幕》一书当中。

得到这些生活故事是一件既费时间又费力气的探究工作。它是通过提出一大串问题才得以完成的。我必须绞尽脑汁地去套他们的话。有些人在此之前从未接受过别人的采访，他们不大清楚我要了解些什么，而且认为，不论讲哪方面的事，只要是自己主动去讲，就会被看成是不够谦虚谨慎。肖克过于担心自己不够谦虚，以至于特地跑来向我表示歉意。我离开延安去西安时，把我的《延安笔记本》藏在背心里，并用自己缝制的安全带把它们束紧。一路上，我从不把它们托付给我的保镖或其他任何人保管，就这样，我一直坚持着从北京赶到上海。因怕丢失这些笔记本，我时刻处于提心吊胆的紧张状态。我最担心的，是这些本子会在西安被没收。虽然我享有治外法权，但是，我毕竟违反了军方的禁令（如果我没有治外法权的保护，那么，首先我就根本不可能到延安去，其次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帮助。而若不是在西安得到一些友人的帮助，我同样不能成行。虽然他们都不赞成我去延安，但是，出于在华外国人之间的患难与共和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还是帮助了我）。

最令我心惊胆战的，还是在我返回北京途中经过潼关中央军检查站时的那一刻。凶神恶煞般的宪兵不由我分说，一古脑儿地把我和我的行李从列车上拖了下来。他们拦截列

车，就是专门要找我的。我心想，可能是蓝衣社的法西斯分子要进行报复了。我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对我和我的丈夫恨之入骨，因为我们在西安戏弄了他们。然而，我并没有被军方逮捕。原来，他们是根据西安方面传来的命令而“扣留”我的，因为在我离开西安后不到几个小时，我丈夫和一位朋友就为找我而到了那里。回西安时，我把延安笔记本藏在了大衣里。随后，我在潼关时乘坐的那辆列车被日本人给炸了。这真是天意啊！

后来，我又带着笔记本到了青岛——以前的德国殖民地。在青岛，我和埃德加分手。他赶往上海采访战事去了。我则通过日本人控制下的天津，回到了日本人控制下的北京。然后，我又从北京返回天津，再由天津乘船赶到上海。在我经过的每一个检查站，中国人都要受到日军的搜身，但外国人他们是连碰也不敢碰的。

我曾为我的延安之行保密——但最终还是被人知道了。我于1937年11月21日抵达上海。在海滨公寓，我和丈夫分别在自己的房间里忙于写作。我们多余的精力只不过是像一对吞食了猫后的金丝雀得意地相视而笑。

我早就期盼着出《红尘》的新版本了。自从该书问世以来，毛泽东的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使得它以增订的形式再版成为一件大事。现在增加一些原来省去的原始材料，载于下卷当中。于是，增订版也就成了一本部头较大、内容更加充实的著作。能够看到它以增订版的形式再次推出，我自然感到高兴，尤其是在目前这种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了解过去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最为复杂的历史现象。

我要向格林伍德出版公司副总裁赫伯特 C·科恩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使这个增订本的出版成为可能。我还要感谢两位编辑贝弗利 H·米勒和珍妮特·林赛。米勒夫人和印刷工人们耐心地辨认了旧手稿，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麦迪逊，康涅狄克州

1971 年 9 月

第一版前言

这里所收录的二十四个人物的自传，是我 1937 年在中国的红色区域做了五个月的采访得来的。当时，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正在写他的《西行漫记》一书，而我也正在中国读书，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我们俩都认为有必要到延安这个当时共产党人的圣地走一遭，以便搜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资料。

考虑到人物传记和回忆录在中国的文献中还很少见，专门的研究著作还难以得到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中国的新闻业还很幼稚，报纸因受到严格的检查而不能提供可靠的信息，因此，对我的研究来说，个人访谈提供了最好的材料。于是，就有了这本书中的个人自传。主题是劝说他们给我讲述个人的生活故事，而把这些自述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内战的思想史著作，当然是来自共产党方面各种不同人物的观点。

到延安后我才发现，共产党的官方人员在 1935 年的长征中几乎丢失了他们所有的文献。在延安的那几个月里，全面收集历史资料的人只有我一个。作为外国人和客人，我的特殊身份给我提供了有利条件，凡是我要采访的个人，出于礼节上的考虑，都给我提供了谈话的时间——甚至那些最繁

忙的人。

虽然传统礼节是一种便利，没有它就得不到这些自述，但是，我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对这些人来讲，写他们的自传完全是件新鲜事。在他们看来，详细地叙述他们个人的生平和成就是一种有失体统的行为。我不得不提出数以百计的问题，以便撬开主人公的金口，挖掘出他们所能讲述——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的故事来。终于，他们一个个都回答了我的问题。他们的叙述被译给我听，结果就成了下面的一个个故事。

我认为，这些个人的生平故事，从采访对象的讲述，到译员的翻译，再到我这里所作的记录基本上是一致的。我所记录下来的这些自传，都完全符合主人公的初衷，未经任何修饰或改动。我尽量保留主人公的谈话方式，宁可在文风的一致性上做些牺牲，而且只有在英语中能够找到几乎相同的表述方法时才避免直译。凡是需要澄清的地方，我都做了注释。

这些自传，有的表现为故事，个别的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总结。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生平讲述得生动有趣。但是，当我回过头来再读这些自传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所展示的个性特征和民族化的观点都是相当鲜明的。在我看来，它们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我相信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它们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在此，我要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全体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去年我生病期间，他们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同时，我还要感谢玛丽·罗德儿，她帮助整理了我的手稿。

书中的大多数照片是我拍摄的。其他的则要感谢刘易斯·甘奈特，他给我提供了几幅20年代去中国旅行时带回的历史

图片。此外，我还要感谢埃德加·斯诺和那些把自己珍贵的长征纪念品——照片和随笔慷慨相赠的中国人，他们是康克清、王震、廖承志和罗炳辉。

麦迪逊，康涅狄克州

1951年11月10日